

# 装病与佯狂：基于小说知识学 视域的考察<sup>\*</sup>

井玉贵

---

**【摘要】**装病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动机与手段均堪称复杂多样。在古代载籍中政治人物装病的情形相当多，其出人意料处与政治斗争之诡谲密切相关。一般而言，装病能否成功受制于性别、年龄、身份、有无基础病等因素，而作为装病特殊形式的佯狂则较少受到这些因素的牵制，却需付出更多的人格代价。透视佯狂行为的本质，须溯源于传统文化中的“人禽之辨”。本文对装病现象的分析显示，身子不快是在爱情故事中女子装病的常见形式，盖因世人默认青春期女子有身子不快的权利，一般情况下不会刻意追究其真实性，这便为装病留下了必要的存在空间。装病内在地蕴含着败露的可能，这便为叙事作品的戏剧化书写提供了优质资源。小说知识学是关于获取知识、活用知识的开放性理论，基于该理论视域，在装病与佯狂书写中蕴含的丰富叙事学价值有待深入发掘。

**【关键词】**装病 佯狂 小说知识学 戏剧化书写

**【作者简介】**井玉贵，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 - 1125 (2024) 10 - 0106 - 20

---

在生活中为了达到各种目的，不可避免地存在伪装行为，装病便是伪装的一种形式。装病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无病装有病，轻病装重病。后一种情况殊为少见：在《弁而钗·情贞纪》中风翔为了跟赵王孙发生同性关系，轻病假装重病，以换取赵王孙的同情；《绣谷春容·吴生寻芳雅集》写吴生病情缓解，却不将实情告知恋人，让恋人仍以其病重前来探望。还有一

---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拔尖项目“小说知识学视阈下的装病/佯狂书写研究”（02011903823052）的结项成果。

种情形是从无病装有病进而发展到装重病：史载明初燕王朱棣入觐还国后，被建文帝严密监视，燕王先是“托疾”，“久之，遂称笃”，<sup>①</sup>便是针对形势采取的连续性装病行为。鉴于轻病装重病的情形在作品中殊少反映，本文主要讨论无病装有病的情况。

佯狂是装病的一种特殊形式，佯狂与装病在行为人的阶层上存在一定分野：装病者可以包括所有社会阶层，而佯狂者则多为具有一定身份的人，或是异人，或是奇士，或是高官甚至帝王。在表现方式上，较之普通的装病，佯狂具有特立独行的性质，在唐释道宣《续高僧传》中卫元嵩师父曾称，佯狂乃是成名的一条终南捷径。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佯狂隶属于装病，但考虑到装病普遍表现于身体，佯狂则以落实于精神状态者居多，而且佯狂在装病书写中已然蔚为大宗，故本文将佯狂与装病并列论述。

本文对装病与佯狂的研究依托刘勇强先生于2018年提出的小说知识学理论<sup>②</sup>而展开。该理论指出，知识在小说艺术世界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小说的知识功能与娱乐、纪实、劝惩功能密切相关，知识之于小说具有整体性、本体性的意义。本文遵循小说知识学相关原理，对古代小说、戏曲及曲艺作品中的装病与佯狂现象进行综合考察，<sup>③</sup>借以管窥装病与佯狂书写具有的叙事学价值。

## 一、动机和手段：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中的装病与佯狂

装病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其动机和手段均堪称复杂多样。装病的表现领域大致分为两类——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两个领域的装病行为既有共通点又有相异处，需要做出必要的分疏。

在古代载籍中政治人物装病的情形相当多，其出人意料处跟政治斗争之诡谲密切相关。在史籍中存在大量的官场装病行为，其名目有“称病”“谢病”“推病”“辞病”“托疾”“引疾”“辞疾”等。此种为求自保的装病行为，一般都在制度允许范围之内，其实质是当矛盾处于可控状态时，斗争双方彼此心照不宣的表演。略举几例。

《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信陵君“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

① 参见谷应泰撰，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点校：《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33页。

② 参见刘勇强：《小说知识学：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维度》，《文艺研究》2018年第6期，第56~67页。

③ 本文运用小说知识学理论解读的作品并不限于小说，对能够体现小说知识学原理的戏曲、曲艺作品，亦一并纳入考察范围。

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sup>①</sup>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谓曹操于汉末乱世拜为议郎，“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sup>②</sup>

《明史·苏伯衡传》记载洪武十年（1377年）征伯衡，“入见，复以疾辞，赐衣钞而还”。<sup>③</sup>

当政治斗争进入难以调和的激化阶段之后，装病便成为躲避杀身之祸甚至谋害他人的有效手段。前一种情况如《孙庞演义》第16~17回写孙膑“假装得病危笃”，“染成疯病”，<sup>④</sup>后诈死哄骗庞涓兴师，寻机以报刎足之仇。后一种情况如《东周列国志》第65回写崔杼欲弑齐庄公，诈称寒疾，先是庄公与崔杼妻棠姜私通，庄公欲借探病崔杼之机，与棠姜相会，终为崔杼所弑。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反复利用装病而较为典型的例子，见于《四大美人艳史演义》之《貂蝉艳史》第13章“病阻逆谋”：董卓欲逼迫汉献帝禅位，王允令貂蝉设法阻止，貂蝉遂在董卓召集士兵哗变前夕，“忽然腹痛起来，宛转呼号，只在床上打滚。到了后来，竟是声微气弱，势甚危殆”；<sup>⑤</sup>华佗看视后说此病乃是鬼魅作耗，而董卓是天生贵人，有他在房陪侍，鬼魅便不敢相逼，貂蝉性命便可保住。小说接着写董卓要指挥哗变而几次出房，貂蝉均假装昏晕过去，促使董卓暂时解散部众。华佗对貂蝉病症的诊断，显系王允与其事先商定，目的即在配合貂蝉装病。当然，连续装病亦有其弊端，即容易带来叙述单调及可信度下降等问题。

汉末有两个特别善于装病的政治人物——曹操与司马懿。司马懿装病留待下文再述。至于曹操装病，除上文所举为避祸而托疾，《三国演义》第1回亦有一段经典描写。曹操幼时厌恶叔父管束，“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当父亲曹嵩闻叔父报告前往看视时，曹操却立即恢复正常状态，言自来无此病，其叔父遂以诬罔而失信于曹嵩。曹操幼时的装病行为，乃彰显其奸雄本色的重要一笔，其艺术效用诚如毛宗岗所评：“欺其父，欺其叔，他日安得不欺其君乎？”<sup>⑥</sup>

① 《史记》卷77《魏公子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82页。

②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页。

③ 《明史》卷285《文苑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11页。

④ 《孙庞演义》第12回写孙膑为了不让未婚妻被太师邹忌之子强娶，用法术让未婚妻装病，以达到让太师退婚的目的。可见装病行为人不一定是本人，这是装病的一种特殊情形。参见吴门啸客著，陈四益校点：《孙庞演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89页。

⑤ 无名氏：《四大美人艳史演义》，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

⑥ 参见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装病者实施装病行为，一般都是针对利益直接相关方，不过也有例外：《水浒传》第119回写在平定方腊后的返朝途中，李俊“诈中风疾，倒在床上”，<sup>①</sup>并请求宋江留下童威、童猛照顾自己，从此脱离宋江，投化外国去了。在这里，装病行为关乎政治选择与人生志向：李俊等人之所以毅然脱离宋江，是为躲避来自朝廷的杀身之祸。

日常生活中的装病行为，动机和手段各有不同，难以统一归类，就其基本性质而言，跟佯狂一样，以维护自身利益者居多。略举几例，以见一斑。

有因懒惰而装病者：敦煌变文《鬻鬻书》谓新妇懒惰，“摸着卧床，佯病不起”。<sup>②</sup>

有为避免冲突而装病者：《生绡剪》第9回写医生申玉峰怕对手寻趁，装病几日，不敢出门。又如金批本《水浒传》第23~24回写团头何九叔验看武大尸首，发现武大系中毒身亡，但慑于西门庆威势，不敢秉公处理，遂咬破舌尖，口吐鲜血，假装中恶。一个在夹缝中卑微地讨生活的小人物形象，因急中生智的装病行为而跃然纸上。

有为行骗或害人而装病者：在北齐时有妖人让弟子伪装成盲人和跛足人，谓饮某处泉水便可痊愈，以此耸动人心，其装病行为接近当今职业医托。<sup>③</sup>张应俞《杜骗新书》“强抢骗”之《膏药贴眼抢元宝》写一棍徒假装被人打伤，伪作瘸行状，出其不意抢夺元宝，这是通过装病来行骗。《金瓶梅》第94回写春梅迫害孙雪娥，故意装病找碴儿；《封神演义》第26回写妲己装出心痛之疾，纣王命比干取心做羹汤以救之，则是通过装病来害人。

有为幽会而装病者：《金云翘传》第3回写王翠翘父亲携家人出门上寿，翠翘为与恋人金重幽会，“托病不行”。<sup>④</sup>

由上可见，装病行为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因装病本身天然地具备戏剧性，这便使其拥有了日常性与戏剧性双重特征。作家如何利用装病组织情节、塑造人物，全视具体情境而定，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在明清时期脍炙人口的几部经典名著中，装病描写取得突出成就的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其对严贡生、王太太、杜少卿这三个人物的装病描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一，第6回写严贡生为了赖掉船钱，先是装病，将云片糕伪装成药

① 王利器校注：《水浒全传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876页。

② 项楚：《敦煌变文选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781页。

③ 参见于庚哲：《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07~108页。

④ 参见青心才人编次，李致忠校点：《金云翘传》，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物，为引诱掌舵的驾长吃掉云片糕做局。根据小说的描写，其装病行为极具表演性：“坐在船上，忽然一时头晕上来，两眼昏花，口里作恶心，嘍出许多清痰来”，家仆“一边一个，架着膀子，只是要跌”，“把他放了睡下，一声不倒一声的哼”。下面便写他开箱取食云片糕缓解病情，童叶庚就此细节评点道：“做得出，装得像。云片糕锁在箱子里，将钥匙开出来。郑重其事，形容绝倒。”<sup>①</sup> 严贡生装病显然经过精心谋划，其为人之无耻、诡诈尽在不动声色的白描中得以显现。

其二，在《儒林外史》中有所为彰显身份而装病的描写：<sup>②</sup> 第26回借媒婆沈大脚之口交代，王太太每日“要吃八分银子的药”，下回写鲍廷玺被养母逐出家门，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太太的人参、琥珀药也没得吃了，病也不大发了”。后来鲍廷玺偶获大哥资助，经济条件大为改善，王太太“身子又有些啾啾唧唧的起来，隔几日要请个医生，要吃八分银子的药”。<sup>③</sup> 王太太的病显然不是真病，而是出自虚荣心的装病行为。为了彰显身份而装病的情节，在此前的《金瓶梅》中已有涉及：第11回写潘金莲在西门庆家恃宠生骄，“颠寒作热”，<sup>④</sup> 其中便有装病撒娇的成分，借以表现其不安分的性格特征。清代小说《金兰筏》第6回讲人处在富贵时节，吃穿用度样样都好，仍然会说身子不快。此外我们注意到，金寄水等在介绍清代王府延医看病情况时说，“王府的内眷好象爱生病似的”，“在王公府第，朱门世家都与中药结有不解之缘，若许只有这样，才显得娇气、尊贵与黎庶不同”。<sup>⑤</sup> 在《儒林外史》中王太太以及在《金瓶梅》中潘金莲的装病行为，均从奢靡生活角度暴露了人性弱点。

其三，在《儒林外史》中有表彰但求心安、逃避笼络的装病描写：第34回写杜少卿辞征辟，假称得了暴病，“忙取一件旧衣服、一顶旧帽子，穿戴起来，拿手帕包了头”。天目山樵在此提醒道：“好的微黄面皮，不用荷叶水染。”第31回交代杜少卿面皮微黄，此时正好可以用来装病。当奉命征召杜少卿的邓知县登门拜访时，“杜少卿叫两个小厮搀扶着，做个十分有病的模样，路也走不全，出来拜谢知县，拜在地下就不得起来”，并取出辞掉征辟的呈子递给知县。针对杜少卿预先写好呈子这一点，天目山樵曾提出这

① 参见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134页。  
② 《石点头》卷12《侯官县烈女歼仇》写董昌在新婚后第二天早上按礼拜见继母徐氏，徐氏假称身子有病，不肯出来，同样是彰显身份的装病行为。参见天然痴叟著，弦声等校点：《石头记（等三种）》，《中国话本大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页。  
③ 参见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574~575、579页。  
④ 参见兰陵笑笑生：《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67页。  
⑤ 金寄水、周沙尘：《王府生活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208页。

样的质疑：“自己尚能写呈子耶？不知何时预写，此间颇有隙漏。”<sup>①</sup>不得不承认，此处的装病描写在涉及呈子一点上确实存在漏洞，吴敬梓运用装病刻画人物的手法尚不够圆融。

佯狂是装病的一种特殊形式，对佯狂行为的文化特征，叶舒宪曾征引美国人类学家比尔斯所言的“在许多场合中，极似精神病的行为模式代表了为实现各种特别目标而得到文化认可的策略”，然后指出“行为者本人并未从病理上改变其常性”，而“作为传统所认可的种种佯狂策略，在历史上获得了充分表现和传承的合法性”。<sup>②</sup>

佯狂人物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而较之普通的装病行为，佯狂具有突出的政治性意涵。箕子佯狂的典故几乎家喻户晓。《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第十》与《东周列国志》第83回皆记在勾践灭吴后计倪佯狂。北宋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1《少师佯狂（杨公凝式）》谓杨因“不登大用，多佯狂以自秽”，人称“杨疯子”。<sup>③</sup>在南宋时徐履省试第一名，秦桧欲妻以女，徐履抗婚，“阳狂，廷对不答一字”，结果状元被黜落，<sup>④</sup>这是以佯狂来抗拒政治性婚姻的典型例证。

一般而言，装病行为能否成功，受制于性别、年龄、身份、有无基础病等因素。相较之下，佯狂则较少受到这些因素的牵制，却需付出更多人格代价。要透视佯狂行为的本质，须溯源于传统文化中的“人禽之辨”。“人禽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问题，下文谈到的孙膑、宋江、朱棣、唐寅等人在佯狂时，有跟猪狗同眠、在屎尿坑里滚及暴露生殖器等行为，便是克服人的本能而跟动物混同，而唯有佯狂到此地步，方有可能被认作真疯。此情此景诚如朱萍指出的，为了使佯狂行为具备逼真效果，行为人不惜赤身裸体和披头散发，“都是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形象，不需要任何语言的辅助，它们就构成了对于文明和理性的反动”。<sup>⑤</sup>

披发是在佯狂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形貌特征，这事关文化传统，值得引起足够重视。箕子是早期有名的佯狂者，《战国策》《史记》等文献均谓其披发佯狂。在春秋时期的人物中，范蠡早年披发佯狂见诸《越绝书》；伍子胥吹箫乞吴市，“被发佯狂，跣足涂面”，<sup>⑥</sup>见于《东周列国志》第73回。披发本为夷狄之俗，引申为化外之人的奇突行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

① 参见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691~692页。

② 参见叶舒宪：《阉割与狂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4~285页。

③ 参见程毅中编著：《古体小说钞：宋元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1页。

④ 参见张邦炜：《宋代婚姻与社会》，郑州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49页。

⑤ 参见朱萍：《中西古典文学中的疯癫形象》，《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4期，第137页。

⑥ 冯梦龙、蔡元放编，黄钧校注：《东周列国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668页。

载平王东迁后，周大夫辛有到伊川去，看到有人披着头发在野地里祭祀，便悲哀地预言道：“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sup>①</sup>《论语·宪问》记录孔子肯定管仲保存华夏文化的莫大功绩，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sup>②</sup>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晋虞预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sup>③</sup>在这里，阮籍的裸袒行为被比作象征华夏文化衰亡的伊川披发，而裸袒与披发同为佯狂常见的形貌特征：裸袒是将人降格为动物，披发是将文明人降格为化外之人。

在古代小说、戏曲中堪称经典的佯狂形象，当数孙臆、朱棣、唐寅等。

吴门啸客《孙庞演义》第6回写孙臆假装疯魔，扯碎天书吞下，“把身上的衣服，横一块竖一块扯得破碎，披头散发，把书院内好古画、好玩器，打的打，掳的掳，一些不留，口里大呼小叫，做出万千呆状”。<sup>④</sup>明代汪廷讷《天书记》传奇第22出《佯狂》写庞涓命人食以犬粪、马溺。元无名氏杂剧《庞涓夜走马陵道》、清代李玉传奇《七国记》及京剧《孙臆装疯》等作品，对孙臆佯狂的描写大同小异。孙臆是不世出的军事家，为了保命复仇并建功立业，在佯狂中甘愿忍受非人的痛苦和屈辱，可见其对自身才华的高度自信。

在古代小说中最经典的佯狂帝王形象是明代的燕王朱棣（明成祖）。《女仙外史》第15回写燕王闻建文削诸藩后，“大骇，因诈称失心疯病，狂走于市，夺人酒食，或哭或笑，胡言乱语，甚至偃卧粪壤中，弥日不苏”。<sup>⑤</sup>《续英烈传》第9回写朱棣不欲开读建文帝诏书，因采纳道衍计谋，“忽然佯狂起来，也不带人，也不冠履，竟跑出宫来，满街乱走”，“走入市中，看见名店饮食，便取来乱吃。哭一回，笑一回，口中胡言乱语”，“走得倦了，看见街上土堆，便睡在上面，全不怕汗秽”。<sup>⑥</sup>此处描写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燕王佯狂表演过程中，一直有近侍跟随，从而确保燕王在取食名店饮食时不会被抓获，否则便无法继续表演了；二是燕王在佯狂时竟然清醒地知道名店饮食美味可口，这个细节无疑暗藏了微讽，这也是佯狂行为具备戏剧性的一个表征。

明代的唐寅是文士中以佯狂避祸而有极为乖戾表现者。王鸿绪《明史稿·唐寅传》记载：“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

① 李梦生：《左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② 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7页。

③ 《晋书》卷82《虞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47页。

④ 吴门啸客著，陈四益校点：《孙庞演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⑤ 吕熊著，刘远游、黄蓓薇标点：《女仙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页。

⑥ 秦淮墨客编次，井玉贵校注：《续英烈传》，书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sup>①</sup>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5谓唐寅在宁王处，使者前来馈送礼物，寅则“裸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讥呵使者”。<sup>②</sup> 唐寅平日便有裸裎的放荡行为，<sup>③</sup> 其在宁王处的“以手弄其人道”，显为特意的加戏之举。<sup>④</sup> 汪琬《唐寅传》谓寅此类行为乃“清狂不慧状”，<sup>⑤</sup> 可谓恰如其分的评断。除了暴露生殖器这样的乖戾行为，唐寅亦有跟其他佯狂者类似的表现：黄周星《补张灵崔莹合传》谓寅“发狂，号呼颠掷，溲秽狼籍”，<sup>⑥</sup> 钱维乔《乞食图》传奇第16出《佯狂》谓寅“敝衣垢面，反戴巾，作疯状”。<sup>⑦</sup>

## 二、身子不快：恋情故事中的装病与佯狂

恋情故事属于日常生活范围，而日常生活中的装病上文已有所论列。不过，考虑到装病在恋情故事中出现频率颇高，并且具有值得总结的一些独特艺术规律，故有必要对其做出独立的考察。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恋情故事的女主人公为了达到各种目的，很多都以身子不快为借口，而所谓身子不快，大率可以视为装病行为。其例如下。

《西厢记》第3本楔子写莺莺对红娘自称身子不快，红娘则洞察其中真相：“‘张生，你好生病重，则俺姐姐也不弱。’只因午夜调琴手，引起春闺爱月心。”<sup>⑧</sup>

李玉《占花魁》传奇第22出《心语》写花魁娘子对丫鬟称身子不快，命将房门反锁，以不在家的理由拒掉来客。<sup>⑨</sup>

《一片情》第1回《钻云眼暗藏箱底》写小妾新玉欲跟邻人燕轻私通，不愿跟年老丈夫同房，遂假称身子不快，丈夫却并不理会，坚持同房，新玉

① 转引自唐寅著，周道振、张月尊辑校：《唐寅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42页。

②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3页。

③ 参见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16~217页。

④ 天花藏主人编次《醉菩提传》第10回写济颠在太后面前打筋斗，“因未穿裤子，竟将前面的物事都露了出来”。古吴墨浪子辑《西湖佳话》卷9《南屏醉迹》所写略同。济颠裸露丑秽可与唐寅“以手弄其人道”参看。参见天花藏主人编，萧欣桥校点：《醉菩提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古吴墨浪子辑，邵大成校注：《西湖佳话》，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⑤ 汪琬著，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7页。

⑥ 张潮辑，王根林校点：《虞初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⑦ 钱维乔著，杜玄图、马振君点校：《钱维乔集》，崇文书局2018年版，第430页。

⑧ 王实甫著，王春晓评注：《西厢记》，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57页。

⑨ 参见李玉著，陈古虞、陈多、马圣贵点校：《李玉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只得先草草打发丈夫。<sup>①</sup>

在恋情故事中女子自称身子不快，暗含了这样一种社会共识：基于对青春期女子生理特征的认识，世人往往默认青春期女子有身子不快的权利，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刻意追究其真实性，这便为装病留下了必要的存在空间。在西厢故事演化过程中的一处描写，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此点：元稹《莺莺传》写在张生救护莺莺一家后，莺莺之母命女儿出见张生，莺莺则“辞疾”，久而不出。此处的“辞疾”仍为男女通用的一般说法，《西厢记》中的身子不快则抓住了青春期女性方便使用的借口。相比之下，恋情故事中的男子虽可同样假称身子不快，但其情形往往需要做出具体说明，而不能仅凭一句轻飘的身子不快便可了事：在《警世通言》卷16《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小夫人因婚姻不般配，留意家中主管张胜，赠以金银衣服，张胜母亲怕引来祸患，假称儿子感冒风寒，身子不快，从而使儿子月余时间不去主家当值。在这里，感冒风寒便是身子不快的具体说明，不可轻易略过。在《型世言》第6回中，汪涵宇晚间欲跟朱寡妇私通，当客伙寻其同往娼家时，他假称身子不快已早睡，并紧闭房门不出。在这里，假称身子不快之所以奏效，离不开谎称早睡的配合。

巧用女子身子不快组织情节而极富戏剧性的小说作品，当数《醒世恒言》卷28《吴衙内邻舟赴约》：女主人公贺秀娥假称身子不快，将饭菜给藏在卧室的情郎吃，引起母亲及众人怀疑，进而以为女儿饭量大增乃是得了一种怪病，前后请来三名医生看视，分别诊断为“疴膨食积”、“孩儿疔”及“老鼠膈”。尤其是最后一名老年太医，胡说“老鼠膈”的症状跟秀娥躲着人吃饭的情形正相符合：“背后尽多尽吃；及至见了人，一些也难下咽喉。”<sup>②</sup>该病俗称“老鼠膈”，当得名于老鼠喜好偷吃的习性。这篇小说的本事出自《情史》卷3“情私”类之《江情》，其中并无对“老鼠膈”等病症的描写。论者指出，医生们的荒唐诊断在传达男女真情上效果颇著：他们对贺秀娥的假病越是关注，情郎吴衙内的真病（饭量大）便越安全，二人的感情亦因此日益加深。<sup>③</sup>较之贺秀娥取饭给暗藏的情郎这一写实描写，明代史槃《吐绒记》、清代王翊《红情言》写男主人公皇甫曾在跳到女主人公（卢忘忧、卢湘鸿）船上后，女子拿出传家元宝郁金香，令皇甫曾含在口中解除饥渴。如此处理虽可摆脱遭人怀疑的困境，但郁金香这种具有神话色彩的物事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艺术的真实性，亦即付出了过高的艺术代价。

在恋情故事中亦不乏男子装病的情形，只不过较之女子装病，男子装病

① 这是女子假称身子不快却未能遂愿的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

② 冯梦龙编著，张明高校注：《三言·醒世恒言》，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90页。

③ 参见李萌昀：《旅行故事：空间经验与文学表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5页。

往往因显得不够自然而时见尴尬。例如，《钟情丽集》写辜辂为了调整居室以接近意中人，先后“诈病不起”“佯狂大叫”，其假称的致病之由是遇到鬼魅。显然，遇到鬼魅使装病行为的自然程度急遽降低了。最为尴尬的装病见于《梅妃传》中的天子唐玄宗：其写玄宗密召梅妃入侍，嫉妒梅妃的杨贵妃突然闯入，发现梅妃侍寝的诸多迹象后，便逼使玄宗出见群臣，自己则原地候驾，此举显为揭出真相。在窘迫之下玄宗乃称“今日有疾，不可临朝”，<sup>①</sup>勉强将此事搪塞过去。洪昇《长生殿》第19出《絮阁》、《隋唐演义》第79回对此有大同小异的描写。一般说来，皇帝拥有绝对权威，但在皇室家庭内部，在特殊情境下皇帝也可能处于弱势，玄宗装病的机理便是如此。

当在恋情故事中出现矛盾爆发的紧急状况时，普通的装病便须适时地升变为佯狂，这是由佯狂本身具备的剧烈性决定的。<sup>②</sup>《旧杂譬喻经》卷上《妇与琢银儿相通喻》写某人妻子跟银匠私通，被丈夫发觉后，妻子教银匠装作发狂，跑到集市上，见人就抱住、拉扯，以此打消丈夫的疑心。在元代宋远《娇红记》小说中，王娇娘父亲许婚帅子，临近婚期，娇娘“乃托疾佯狂，蓬头垢面，以求退亲”，<sup>③</sup>其父知为佯狂，迫之使从，娇娘又欲引刀自裁。元人郑禧《春梦录》写吴氏女倾心于己，不愿嫁给周氏子，“因佯狂掷冠于地，母怒殴之，发愤成疾”，未几便卒。在给郑生的回信中吴氏女称“奴佯疾佯狂”，<sup>④</sup>以此表明对恋人一往情深。说到底，“佯疾佯狂”正是从装病发展到佯狂的语言表现。

审视恋情故事中的女子装病，不难注意到其具有职业性特点，最显明者便是妓女往往会职业性地装病。唐代孙棨《北里志》之《张住住》写张为妓者，年将及笄，为了不被富人梳梳，在上巳日不随家人踏青，“以疾辞”，<sup>⑤</sup>以便与恋人幽会。《绿窗新话》卷下《张住住不负正婚》为该故事的概述。利用妓女惯于装病可以编织复杂情节：在《初刻拍案惊奇》卷25《赵司户千里遗音，苏小娟一诗正果》中，钱塘名妓苏盼奴不愿接纳於潜商人，先是推病不见，“以后果然病得重了，商人只认做推托，心怀愤恨”，<sup>⑥</sup>

① 程毅中编著：《古体小说钞：宋元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45页。

② 《西游记》第93回写天竺国公主被妖精所摄流落僧院，“恐为众僧点污，就妆风作怪，尿里眠，屎里卧”。当时公主所处环境堪称险恶，普通装病不易保护自己，只好采取更为剧烈的佯狂行为。参见吴承恩著，李天飞校注：《西游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170页。

③ 宋远撰，林莹校证：《娇红记校证》，中华书局2024年版，第187页。

④ 程毅中编著：《古体小说钞：宋元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32、635页。

⑤ 丁如明、李宗为、李学颖等校点：《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4页。

⑥ 凌濛初编著，张明高校注：《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73页。

由此导致商人将她（其时已逝）和妹妹攀扯进官司——苏盼奴先是装病，结果后来真得了重病，却被商人认定为装病，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显为在商人头脑中早就有妓女善于装病的前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坊间流行的诸多版本的卖油郎占花魁故事中，不同艺术形式对装病的运用有所不同：在《醒世恒言》之《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在卖油郎初见花魁时，花魁不愿接纳他，故意把自己灌醉；在同名子弟书中，则改写为花魁先假称有病，后又把自己灌醉。<sup>①</sup>《卖油郎独占花魁》小说还写吴八公子屡次来见，王美娘每次都托故推辞，反锁房门，同名子弟书则写花魁“故意托病将门关”。<sup>②</sup>两相对比可见，子弟书在利用妓女职业性装病上更为自觉。

谙熟妓女生活习性的余怀在其著作《板桥杂记》中卷“丽品”中，如此记述名妓李十娘的为人行事：“于时流寇江江北，名士渡江侨金陵者甚众，莫不艳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闭匿，称善病，不妆饰，谢宾客。阿母怜惜之，顺适其意，婉语辞逊，弗与通。惟二三知己，则欢情自接，嬉怡忘倦矣。”<sup>③</sup>从中可见，名妓倾向于选择性地接纳客人，“称善病”便是其辞掉不愿交接的客人的常见手段。在清代小说《生销剪》第10回《竹节心嫩时便突，杨花性老去才干》中，从良妓女马翠儿不愿接纳不喜欢的男子，“只是回却有病”。<sup>④</sup>马翠儿虽然已经从良，来自青楼生涯的装病拒客习惯却保留下来了。

### 三、取信于人及其败露：装病与佯狂的戏剧性书写

装病行为的表演性决定了其演进发展必然富于戏剧性，其戏剧性之生成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客观形势发展导致装病无法继续，如李渔《十二楼》之《生我楼》故事写尹小楼为了试探义子是否有孝心，装病让义子服侍，后来元兵入侵，无法继续装病，只好向义子说明真相。又如笔炼阁主人《五色石》卷5“续箕裘”故事，写继母谗害继子，假装犯心疼病，让继子服侍，以使用放置砒霜的药物诬陷继子。后来其亲子走失，继母真的害起心疼病，作者就此揶揄道：“当初是假疾，今日是真病。”<sup>⑤</sup>二是由于他人揭穿等情况导致装病行为败露而产生的戏剧性，这是本部分讨论的重点。

① 参见黄仕忠、李芳、关瑾华编：《子弟书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5页。

② 黄仕忠、李芳、关瑾华编：《子弟书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531页。

③ 余怀著，李金堂校注：《板桥杂记：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④ 李落、苗壮校点：《生销剪》，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页。

⑤ 笔炼阁主人等原著，陈翔华、萧欣桥校点：《五色石（等两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装病行为之所以存在败露的风险，是因为装病往往需要症状支持方能取信于人，而症状并非轻易便可具备。<sup>①</sup>例如，《东周列国志》第83回写吴亡后，文种心记范蠡之言，称疾不朝，越王“忽一日往视文种之疾，种为病状，强迎王入”。<sup>②</sup>显然，勾践对文种称疾并不信任，特意搞了一次突然袭击，迫使文种装出有病的样子。又如《弁而钗·情烈纪》第1回写文韵被岳父陷害入狱，同情其遭遇的禁子帮他写病呈，让他假装病重，由其母将他保出。当知县怀疑文韵是否真病时，“禁子又替他脸上涂些黄梔水，妆得蓬头垢面，似非人形”。<sup>③</sup>禁子谙熟保人出狱的法律程序，乃犯人装病得以成功的前提条件。与采用化妆术实施装病不同，有时装病需付出身体损伤的代价，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所谓装病便是就主观动机而言，从损伤身体的事实看则是真病，如《隋唐演义》第93回写王维被叛军俘获，“乃服药取痢，佯为瘡疾，不受伪命”。<sup>④</sup>在妓女装病故事中，则有损伤身体与美貌并存的情况：在《青泥莲花记》中有一则记在正德南巡时，南京旧院妓王宝奴为了避免被召见，“佯称病，数日不食，令貌瘠，仍以药涂其身，若素有疡者”。正德侍从刘姓称“南人易为容”，可见他发觉了宝奴的作假，但仍将其推荐给正德，结果“御即遣还”，<sup>⑤</sup>由此可见，宝奴费心装病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使用药物以便快速制造症状，在《颜氏家训·名实》中亦有1例：有位大官在居丧期间，为刻意显示孝心而装病，遂用巴豆涂脸长出疮疤。<sup>⑥</sup>

历代朝廷对官员装病行为早有防范，如明代为了防止官员托疾谋取私利，一度加强对官员病情的查勘，并加大对托疾诈病的治罪力度，<sup>⑦</sup>这是朝廷打击消极为官而实施的必要举措。从嘉靖四年（1525年）吏部尚书廖纪上疏所言，便可见当时官员托疾谋利盛行之一斑：“正德以来，士多虚誉而希美官，假恬退而图捷径，或因官非地，或因职业不举，或因事权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辄假托养病致仕。”<sup>⑧</sup>至于此前正德三年（1508年）御史杨南

① 《隋史遗文》第60回写秦琼托病而免于介入李世民兄弟之争，虽无明显症状，但仍令人信服：“我数年间战争，身上血也流去二三斗，怎得不病？”见袁于令编撰，冉休丹点校：《隋史遗文》，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03页。

② 冯梦龙、蔡元放编，黄钧校注：《东周列国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86页。

③ 侯忠义主编：《明代小说辑刊》第2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878页。

④ 褚人获编撰：《隋唐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9页。

⑤ 参见梅鼎祚纂辑，田璞、查洪德校注：《青泥莲花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⑥ 参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90页。

⑦ 参见张思琪：《明代文官病假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32~43页。

⑧ 《明世宗实录》卷55，嘉靖四年九月乙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342页。

金不堪都御史之挞辱，以养病求去，刘瑾矫旨谓其“无病欺诈”，<sup>①</sup>将其削职为民，乃假借制度规定以权谋私。在清代，《钦定吏部铨选满官则例》对满洲文官告病亦有专门规定：“如实系患病，令该管官委员确实查明，并无捏饰，酌量给以假期……如系无疾提称有疾呈报者，另经发觉，照例议处。”<sup>②</sup>此类情况在古代小说中偶有反映：《歧路灯》第10回写谭孝移不愿保举贤良方正而告病，礼部派人验明药方，取具甘结，判定委系患病而非装病；<sup>③</sup>《生花梦》第9回写即将升职的官员不愿去闽中倭寇肆虐处任职，“不惜告病，定假乞休”。<sup>④</sup>

官员装病有被揭穿的可能，平民装病同样并非易事。《后汉书》《三国志》华佗本传皆记其诈称妻子生病，不愿返回曹操处，曹操怀疑其中有诈，派人查检——对此，《三国演义》未加描写。《儒林外史》第1回写王冕不愿去见趋炎附势、酷虐小民的时知县，邻人秦老替他出主意，让其假称抱病在家，前来传取王冕的翟买办则威胁道：“害病，就要取四邻的甘结！”<sup>⑤</sup>可见平民向官方装病，需要提供相关证据，仅凭空言无济于事。同书第11回写杨执中不愿赴任寡淡的县学教谕之职，“力辞了患病不去”，然仍需“地方官验病出结，费了许多周折”。<sup>⑥</sup>杨执中的廪生身份高于平民，其跟官方打交道的经历，更可见装病之不易实施。

装病往往需要症状支持，这就为叙事作品制造戏剧性提供了方便。《林兰香》第32回写腊月风雪天友人邀耿艮外出赏梅，耿艮托病辞却，不料友人信以为真而上门探望，“耿艮只得作出不可以风的样子来接见”。<sup>⑦</sup>唐无名氏撰《玉泉子》之《李福女奴》故事，写李福欲跟女奴私会，假称腹痛，不料妻子裴氏信以为真，前来察看，李福不得不装出疼痛难忍的样子，“裴极忧之，由是以药投儿溺中进之”。<sup>⑧</sup>这是在装病故事中特别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在故事中，裴氏虽是性妒之人，但她对丈夫的关怀发自肺腑：丈夫不忠于妻子的一次装病行为，却探测出性妒妻子的真情，换言之，此时的装病成为解妒的良药——这是该故事最耐品咂之处。

若论将装病关目置入具有网状结构的长篇小说，从而产生连绵不断、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当首推《红楼梦》第73回中的宝玉装病。为了逃避贾

① 谷应泰撰，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点校：《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40页。

② 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3页。

③ 参见李绿园著，栾星校注：《歧路灯》，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第113页。

④ 娥川主人编次，李德芳点校：《生花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⑤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11页。

⑥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246页。

⑦ 随缘下士编辑，徐明点校：《林兰香》，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5页。

⑧ 阙名：《玉泉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政次日盘查功课，晴雯教宝玉以被吓的借口装病，为了取信于人，说宝玉吓得脸色都变了，浑身发热，声称要去上房取安魂丸药。晴雯煞有介事地为宝玉生病制造舆论，结果引起了连锁反应：由贾母命令查赌开始，山雨欲来之气氛日浓，终于导致抄检大观园的总爆发，司棋、晴雯等人的悲剧命运就此铸成。护花主人深有会心地评论道：“晴雯教宝玉装病，故意乱闹，因此惹出金凤、香囊等事，以致司棋及迎春之乳母等人或死或逐，均受其害，而晴雯亦即被逐殒命。害人即以自害，报施甚速。”<sup>①</sup> 上述大段描写既戏剧性十足又令人信服，陈其泰谓之“小波澜生出大风浪”。<sup>②</sup> 宝玉装病看似偶然，实则深植于父子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即宝玉不愿遵从父命走仕途经济之路。换言之，父子矛盾最终以牺牲他人的特殊方式爆发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更加耐人寻味的悲剧形式。

前文提到妓女群体存在职业性装病行为，这自为嫖客群体熟知，装病被揭穿的势能便由此生成。李玉《占花魁》第22出《心语》写花魁假称身子不快，反锁房门，拒绝来客，权豪万侯府来人传唤花魁陪伴游湖，习知妓家反锁房门拒客的惯伎，遂打破房门，带走花魁。在子弟书《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老鸨王九妈配合花魁装病，说“他（花魁）刘姨接去看病尚未还，药服数剂还未好”，并发誓“虚言一句烂舌尖”。老鸨的话如何能瞒过凶蛮的行家：“吴八公子全不信，吩咐家人往里翻。”<sup>③</sup> 同样以强力带走了花魁。元代夏庭芝《青楼集》记述王巧儿已有意中人，不愿接纳富商，“辞以疾，悲啼宛转”，然富商并未因之而放弃，用强时被巧儿“掐其肌肤皆损，遂不及乱”。<sup>④</sup> 妓女拒客的惯伎既然不奏效，维护自身利益便只能使用强力了。

政治斗争的酷烈性决定了装病在从表演到揭穿的过程中必有丰富的戏剧性。在古代小说中孙膑、司马懿、宋江、朱棣的故事便堪称典例，其中司马懿、宋江的故事则将装病的叙事学价值展露无遗。

《孙庞演义》写庞涓不信孙膑真疯，用粪当饭来试探他；孙膑夜间则与猪犬同眠。《东周列国志》第88回写孙膑诈作疯魔，庞涓恐其佯狂，为试其真伪，“命左右拖入猪圈中，粪秽狼藉，膑被发覆面，倒身而卧”。庞涓又使人送酒食给孙膑，假意对他表示同情，亦为孙膑识破奸计。庞涓使者又“拾狗矢及泥块以进，膑取而啖之”。<sup>⑤</sup> 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施虐

① 冯其庸纂校订定：《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2页。

② 陈其泰评，刘操南辑：《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

③ 参见黄仕忠、李芳、关瑾华编：《子弟书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531页。

④ 参见夏庭芝著，孙崇涛、徐宏图笺注：《青楼集笺注》，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

⑤ 参见冯梦龙、蔡元放编，黄钧校注：《东周列国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837页。

者在残害行为中获得变态的快乐，被害者则从精神上对施虐者投以鄙视。

司马懿堪称古代小说装病形象系列之第一人。善于伪装是司马懿终成大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其间装病便是其伪装行为中最见性格的一种形式。史载建安六年（201年）司空曹操辟司马懿为上计掾，司马懿不欲就职，“辞以风痹，不能起居”，曹操疑心其装病，“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引按：司马懿）坚卧不动”，<sup>①</sup>其惊人的意志力令人骇惧。这一年司马懿23岁。司马懿登峰造极的装病表演，发生在近50年后的高平陵之变，是年司马懿71岁。

在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发生前，司马懿长期诈病在床，便是静待曹爽离开京师洛阳的时机。<sup>②</sup>《三国演义》第106回写曹爽派心腹李胜探查司马懿病情虚实，司马懿洞晓李胜拜辞自己的动机，故而在李胜面前竭力装病：先是“去冠散发，上床拥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在跟李胜交谈过程中，装作耳聋，故意听错李胜的话，侍婢服侍进汤时“将口就之，汤流满襟”，自言死在旦夕，“言讫，倒在床上，声嘶气喘”。<sup>③</sup>相较《三国演义》，《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裴注引《魏末传》的记载更为精彩，其谓司马懿“言渴求饮，婢进粥，宣王持杯饮粥，粥皆流出沾胸”。<sup>④</sup>在这一场装病与试图揭穿的政治博弈中，李胜完全被司马懿的假象骗过，<sup>⑤</sup>观司马懿惨状不禁为之涕泣，《晋书·宣帝纪》记其回来向曹爽汇报，谓司马懿“尸居余气，形神已离”，<sup>⑥</sup>不足为虑。《魏末传》写司马懿跟李胜暗斗过程，其中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李胜在与司马懿交谈时说“众情谓明公方旧风疾发，何意尊体乃尔”，<sup>⑦</sup>可见司马懿装病是以旧日所患风疾为前提的。

在古代小说中运用癫狂知识塑造人物而达致活灵活现境界者，《水浒传》中的宋江也不遑多让。第39回写黄文炳告发宋江题反诗，戴宗教宋江装疯蒙混过关，于是宋江在屎尿坑里滚，胡言乱语，装出“失心疯”的样子。此处描写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王利器先生为“失心疯”做注时，先引明人王肯堂《证治准绳·癫》之“癫病，俗谓之失心疯”，再进一步解释道：“癫病出《内经》癫狂等篇，其证多为言语错乱，不知污秽，弃衣狂呼乱叫等现象，现在名为

① 参见《晋书》卷1《宣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页。

② 参见朱子彦：《司马懿传》，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56页。

③ 参见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4~1305页。

④ 《三国志》卷9《魏书·曹爽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5页。

⑤ 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便知司马懿是装病。

⑥ 《晋书》卷1《宣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页。

⑦ 《三国志》卷9《魏书·曹爽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5页。

精神分裂病。”<sup>①</sup>

其二，小说写蔡九知府在审问时宋江大发狂言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领十万天兵，来杀你江州人。阎罗大王做先锋，五道将军做合后。与我一颗金印，重八百余斤。杀你这般鸟人！”<sup>②</sup>

按《黄帝内经·灵枢·癫狂第二十二》记癫狂症状道：“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sup>③</sup>又传为华佗著《中藏经·水法有六论第十五》有道：“行之极也，有能歌笑者，有能悲泣者，有能奔走者，有能呻吟者，有自委曲者，有自高贤者。”<sup>④</sup>有学者认为这也是在描述癫狂之疾。<sup>⑤</sup>对比医书记载，可见在《水浒传》中宋江佯狂的表现非常符合癫狂诸症状，几可乱真。根据小说知识学基本原理推断，《水浒传》作者必定具备关于癫狂的知识，并且预计这些知识一定能得到读者的理解和认同，从而达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顺畅交流。

我们注意到，汪廷讷《天书记》第22出《佯狂》写孙膑声称要见玉皇，清人编撰的《东周列国志》第88回、《鬼谷四友志》卷1写孙膑诈作疯魔时，均称有10万天兵相助，当是借鉴了《水浒传》对宋江的描写，同样符合《黄帝内经》《中藏经》对癫狂患者“自高贤”“自尊贵”的症状描述。

宋江如此苦心孤诣地装疯，不料其被揭穿的过程却十分简单：蔡九知府在询问了狱中的管营、差拨后，得知宋江在入监时“不见有风病”，“只是近日举发此症”，<sup>⑥</sup>于是对宋江严刑拷打，迫使其招认题写反诗。显然，宋江用心装疯与迅速被揭穿透露出些微讽意，而这种情节上的转折与顿挫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叙事学价值，缘自装疯本身便蕴含着被揭穿的可能。

在朱棣故事中关于装病与揭穿装病的描写一共表现了4个人物——朱棣、张昺、谢贵、葛诚，这对丰富装病描写的层次性有所启示。《续英烈传》第9回写燕王装病，布政张昺、都司谢贵入宫问疾，“此时夏月，天气炎蒸，见燕王拥着烘炉而坐，犹寒战不已”，<sup>⑦</sup>对此张昺轻率地信以为真，谢贵却审慎地表示怀疑，长史葛诚则揭示其中有诈。

利用装病者下意识的举动揭露真相，在装病故事中特别具有说服力与戏剧性。史载司马懿不愿在曹操属下为官，假托风痹，在某日晒书时天降暴

① 参见王利器校注：《水浒全传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7~1718页。

② 王利器校注：《水浒全传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4页。

③ 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58页。

④ 黄作阵校注：《中藏经校注》，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⑤ 参见陈胜昆编著：《中国疾病史》，台湾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出版部1981年版，第191页。

⑥ 王利器校注：《水浒全传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6页。

⑦ 秦淮墨客编次，井玉贵校注：《续英烈传》，书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女仙外史》第十五回写张、谢二人问疾亦有类似描写。



雨，“不觉自起收之”。<sup>①</sup>在家中婢女发现这一行为后，其妻张氏怕泄露装病真相，亲自杀掉婢女以灭口。在文学作品中利用下意识呈现装病真相者，以唐代名将尉迟恭的故事最为典型。

元人杨梓《功臣宴敬德不服老》杂剧写尉迟恭在功臣宴上打落王叔李道宗门牙，罢职闲居，3年后高丽国犯边，尉迟恭不愿出战，假装有风疾，徐茂公奉命前来探察。尉迟恭怕跟徐茂公交谈时忘了装病，让妻子及时提醒“你的拐儿”，他便装出发病的样子。徐茂公见尉迟恭容貌正常，“两条胳膊犹如铁柱一般”，<sup>②</sup>不像有病，故而命军卒搅扰其家，迫使尉迟恭出手，从而暴露其装病的真相。明无名氏《金貂记》传奇据杨梓此剧改编。《功臣宴敬德不服老》的第3折昆腔称为《北诈疯》，简称《北诈》。京剧有剧目《敬德装疯》，川剧、徽剧等地方戏亦有演出，足见尉迟恭装病的故事大受戏剧观众欢迎。

在明代诸圣邻《大唐秦王词话》第55回中，徐茂功揭穿装病的手段亦甚高明。书叙突厥犯边，贬在皇庄闲住的尉迟恭不愿赴朝听用，假装“四肢无力，遍体顽麻，不能行动”。<sup>③</sup>徐茂功带两名医士前往诊治，尉迟恭原本无病，自然不愿诊治，尤其是看到医士所携十数长针，心生恐惧，不由得举起竹节鞭惊吓医士，从而无法继续装病。

我们注意到，装病故事很多都以被揭穿为结局，不过也有例外，即在揭穿后继续让对方装病，以便实现某个特殊目标，这是装病书写的一种变体。例如，《三国演义》第75回写吕蒙苦于荆州有备，难以袭取，乃托病不出。陆逊知其诈病，在前去探视时见吕蒙“果然面无病色”。陆逊教吕蒙托疾辞职，吕蒙又举陆逊自代，以麻痹狂傲的关羽。毛宗岗在本回总评中写道：“陆逊知吕蒙之假病而又教之以托病，是以病医病也。”<sup>④</sup>

一般说来，装病关系双方中的一方若因装病而获利，另一方便要受害，尤其是处于不同阵营的双方更是如此。不过，在有的装病故事中，装病者与揭穿者均从中获益了，这无疑是在装病故事中颇富意味的特例。迄今为止，我们仅从钱维乔《乞食图》传奇中看到这样的描写：第16出《佯狂》写宁王之妾妃怀疑唐寅不是真病：“见他言多调笑，况且容非枯槁。虽然垢面蓬头，依旧玉山清皎。他心中自了，他心中自了。待学个佯狂高蹈，便此去逃名海岛。”内监建议拘禁唐寅，宁王却另有考虑：“此人薄有才名，也算东南之望。若果

① 《晋书》卷31《后妃传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48页。

② 参见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页。

③ 诸圣邻著，杜维沫校点：《大唐秦王词话》，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88页。

④ 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17页。

然不愿在此，拘之无益。不如释去。也足彰孤家礼贤下士之名。”<sup>①</sup>可见只要做出了佯狂姿态，就有可能产生相应的社会效果，当权者有时会虑及这种社会效果，尽管其对佯狂者仍有疑心，却有可能放佯狂者一马。

#### 四、余论

刘勇强先生指出，小说知识学的核心要义在于：“努力将知识化书写文学化，便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内在动力。”<sup>②</sup>换言之，小说知识学是关于获取知识、活用知识的系统性理论，而获取知识又是活用知识的前提。作家获取知识的渠道主要有两条，即书本与生活。就本文的论题而言，有关历史人物的装病知识或者来源于史书，如司马懿、朱棣等；或者在某个历史因由基础上进行虚构，如尉迟恭、唐玄宗等。相比之下，有关世俗人物的装病知识往往直接来源于生活，而且有待作家的观察与总结，如作家发现妓女职业性装病并沉淀为一种性格，此种性格则源自妓女以身事人之无奈处境。毫无疑问，作家对此类知识掌握得越是深细，在艺术上可供驰骋的空间便越宽广。

小说知识学强调，小说的知识功能与娱乐、纪实、劝惩功能密切相关，而在娱乐、纪实与劝惩三种功能中，娱乐功能处于将知识化书写文学化的核心地位。石昌渝先生曾经指出：“娱乐是小说的原生性功能。”<sup>③</sup>就此而言，装病的戏剧性天然地带来了娱乐效果。历代作家不约而同地致力于装病行为的描写，正是深谙小说本性的表现。当然，娱乐功能的实现离不开纪实功能的支持：作家在描摹装病时的知识储备之一，便是如何装病方能取信于人，这就需要作家具备相关医药知识、行业知识及心理知识等。在娱乐功能与纪实功能的合力作用下，作品的劝惩功能方可有效地发挥出来，正反两方面的例证上文已有所论列，此处不再赘述。

以上是对本文的论题与小说知识学理论相关联的简要说明。接下来对前文未遑论及的几个问题稍作申述，这些问题同样可以在小说知识学理论框架中予以阐明。

前文所述装病大多都能予以实施，但也偶见装病不成功的特别情况，需要投以必要的关注。在《西湖二集》卷27《洒雪堂巧结良缘》中，男主人公魏鹏两次试图装病均告失败，这说明装病成功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并非轻易可以奏效。一次是魏鹏欲与恋人相会，在朋友拉其狎妓时，假推有疾，结

① 参见钱维乔著，杜玄图、马振君点校：《钱维乔集》，崇文书局2018年版，第431页。

② 刘勇强：《小说知识学：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维度》，《文艺研究》2018年第6期，第59页。

③ 石昌渝：《中国小说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果朋友“不顾死活，一把拖出”，只好随其前往；一次是魏鹏托病不愿参加会试，“怎当得母亲、二兄不容，催逼起身”，只好前去。<sup>①</sup>分析起来，第一次装病不成，大概是因为魏鹏仅仅口称有疾，身体状况却不支持其托词；第二次装病不成，除了同样的原因，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科举考试关乎前途命运，托病不成功正是科举成功的前提条件。由此可见，在科举制度下功名前途才是第一重要的，普通病痛统统需要给科举让路。

以上论述可以给我们留下一个深刻印象：装病行为往往具有突出的自利倾向。不过，在古代载籍中也偶见利他倾向的装病行为，生活与人性的复杂由此可窥一斑。试举2例以做说明。

其一，在陆圻《新妇谱》中规定：若婆婆佞佛入寺烧香，新妇可以“托病不得随行”。<sup>②</sup>此处新妇的装病，并非对婆婆不孝，而是委婉地抵制婆婆佞佛，此举实具有一定利他倾向。

其二，《红楼梦》写宝玉被父亲责打，黛玉前来探望，宝玉安慰黛玉道：“我虽然捱了打，并不觉疼痛。我这个样儿，只装出来哄他们，好在外头布散与老爷听，其实是假的。你不可认真。”姚燮眉批称赞宝玉：“到此地位，还一味为林妹妹怜惜，宝哥哥真情种也。”<sup>③</sup>

纵览文献不难发现，普通装病选择腹痛的很是常见。我们可以从一个故事的演变中体会此点：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宋存标《情种》卷4《吴中孝子》皆谓姑苏某卖酒人妻子与婆婆不睦，在丈夫出外做生意期间，采取“佯疾”的方式，把生意推给婆婆，其“佯疾”的“疾”究何所指，难以断定。陆人龙《型世言》第3回据此改编，叙钱掌珠为了让外乡人在店中相看婆婆，装病不去看店：她假装肚疼，“蹙了眉头，把两手紧揉着肚子，在床里滚”。<sup>④</sup>假装腹痛之所以是在装病时较多采用的一种形式，盖因其具有较易实施又不便检验的特点，前举《貂蝉艳史》中的貂蝉便是假装腹痛，《旧杂譬喻经·王赦宫中喻》写太子不满母亲外出招摇，“便诈腹痛而还”，<sup>⑤</sup>同样是利用了假装腹痛较为简易这一点。

如果说假装腹痛具有普适性强的特征，那么在某些特殊情境下的装病，则几乎具有唯一性：在《喻世明言》卷28《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黄善聪女扮男装，与男性商业伙伴同食同眠，为了不暴露女儿身，假称自幼患有寒疾即怕风，每晚和衣而睡，9年间得以相安无事。可以说，假称患有寒疾

① 参见周楫纂，陈美林校点：《西湖二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57、460页。

② 张福清编注：《女诫——妇女的枷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③ 参见冯其庸纂校订定：《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51页。

④ 陆人龙著，覃君点校：《型世言》，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页。

⑤ 孙昌武、李庚扬译注：《杂譬喻经译注（四种）》，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6页。

便是她能找到的最佳借口。小说的本事见于《双槐岁钞》《情史》等书，书中言及装病时仅有“称疾”“有疾”等模糊语，说服力显然不如话本小说明确点出寒疾。类似性质的例子亦见于《风流悟》第2回：阴氏为了不被掳掠她的总兵官所污，诈称患有沙淋血败病的“暗疾”，患有此病须避免性接触，从而得以保持贞操。阴氏急中生智假称的病症，因针对性极为明确而几乎具有了唯一性。

前文曾经论及，古代官员为谋取私利，有时会利用制度规定来装病。在恋情故事中的装病有时也存在类似情形，即表面符合礼法，实质却构成了背离。例如，《肉蒲团》第10回写艳芳跟未央生白昼私通，为了遮人眼目，假称生病不出门。古代礼法对女子外出有严格限制，女子假称有病不出门，便不易被人察知内情，这就为私通觅取了一个符合礼法的借口。

探讨装病叙事，不可忽略装病时间这一重要因素。就前文论及的事例看，装病时间一般不会太长，但若在装病时表现的症状比较严重，便须适当延长装病时间以掩人耳目。例如，《儒林外史》第34回写杜少卿为辞征辟，装出虚弱不支的样子，在如愿辞掉征辟之后，“在家有许多时不曾出来”，<sup>①</sup>其间不得不推掉他人的宴请。相较于日常生活中持续时间短暂的装病，超长时间跨度的装病常见于政治斗争领域。史载杨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sup>②</sup>假称脚蜷曲不能伸直，以致10年不走路，其坚忍令人震惊。为了一举诛除曹爽集团，司马懿曾长期诈病在床，其性格之阴鸷可见一斑。无独有偶，在外国文学作品中也有类似装病描写，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国作家司汤达在《红与黑》上卷第26章中，写于连想到16世纪罗马教皇西克斯特五世的传奇事迹：其在当选教皇前的15年间，假装体弱多病，拄杖而行，让40位红衣主教误以为他不久于人世而故意选他，在成功当选之后，他便扔掉拐杖，励精图治。<sup>③</sup>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材料主要取自中国古代载籍，如果多方引入海外文献中的装病与佯狂材料，则在比较视野下这一课题当有更为深广的探讨空间。

(责任编辑：延 缘)

①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693页。

② 《后汉书》卷54《杨震列传附杨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89页。

③ 参见[法]司汤达：《红与黑》，张冠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